



〔晋〕常璩撰
刘琳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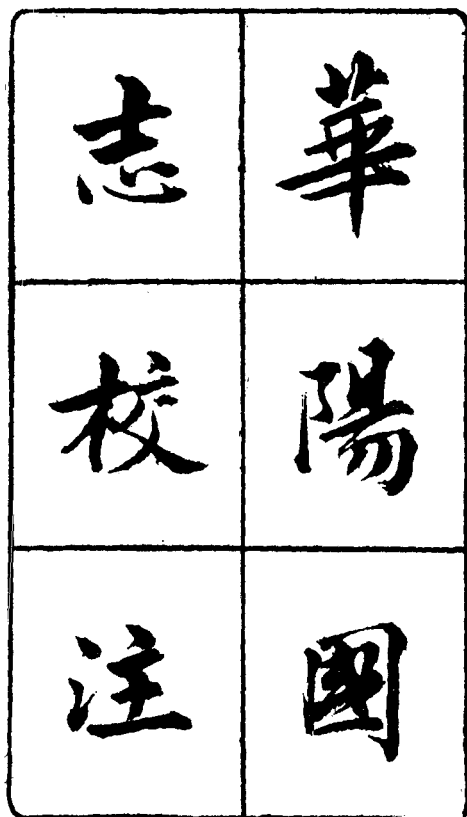
华阳国志校注



巴蜀书社

〔晋〕常璩撰

刘琳校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85679

985679

巴蜀书社出版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袁庭栋

封面设计：陈世五

装帧设计：盛寄萍

华阳国志校注

〔晋〕常璩撰 刘琳校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31.5 插页 7 字数 600千

1984年7月第一版

198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精装本1—2,150册

书号：11329·2 （精装本） 定价：7.15 元

目 录

DL38/09

前 言 1

卷一 巴志 15

总 叙15 巴 郡55 巴东郡71
涪陵郡83 巴西郡90 宕渠郡96

卷二 汉中志 103

总 叙103 汉中郡122 魏兴郡128 上庸郡134
新城郡138 梓潼郡144 武都郡155 阴平郡165

卷三 蜀志 175

总 叙175 蜀 郡227 广汉郡252 犍为郡270
江阳郡289 汶山郡295 〔汉嘉郡〕304 越嶲郡306

卷四 南中志 333

总 叙333 牂柯郡378 平夷郡386 夜郎郡389
晋宁郡393 建宁郡402 平乐郡412 朱提郡414
南广郡419 永昌郡424 云南郡442 河阳郡450
梁水郡452 兴古郡455 西平郡461 附：交趾462

卷五 公孙述刘二牧志 471

公孙述471 刘 焉485 刘 璋490

卷六	刘先主志	505
卷七	刘后主志	545
卷八	大同志	601
卷九	李特雄期寿势志	661
	李 特、李 雄661 李 班677 李 期679	
	李 寿681 [李 势] 693	
卷十上	先贤士女总赞(上)	699
	序699 蜀郡士女701 [巴郡士女] 737	
卷十中	先贤士女总赞(中)	739
	广汉士女739 犍为士女770	
卷十下	先贤士女总赞(下)	791
	汉中士女791 梓潼士女816	
卷十一	后贤志	833
	文 立836 柳 隐840 司马胜之842 常 昂843	
	何 随846 王 化847 陈 寿849 李 宓852	
	杜 轸858 任 熙861 王长文862 寿 良865	
	何 攀866 李 毅873 杨 邠877 费 立878	
	常 璩880 常 宽881 谯 登883 侯 徽885	
卷十二	序志并士女目录	891
	序 志891 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913	
	益梁宁三州两晋以来人士目录953	
附录一	华阳国志佚文	961
附录二	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	977
附录三	本书校注辑佚引用书目及简称	998
附录四	吕大防、李璲序	1004

前言

一 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以下亦简称《常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常璩，字道将，出生于蜀郡江原县（今四川崇庆县）的一个世家大族。灌县旧志谓常道将废宅在治南三十里，即今灌县太平公社一带，或有所本。其生卒年代无可考，生平事迹史书记载也很少。只知他少好学，后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孙盛称之为“蜀史”。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为完成《华阳国志》等著作创造了条件。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伐蜀，常璩等劝李势降；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①大概后来在东晋王朝不甚得到重用，或为中原、江左的士大夫所排挤，因此他在《华阳国志》中每每借题发挥，牢骚溢于言表。

常璩的著作除《华阳国志》外，尚有在成汉时写的《汉之书》十卷，记成汉历史；后入晋秘阁，改名《蜀李书》。^②此书久已失传，惟《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中尚引有佚文数条，其中称李雄为“武帝”、李班为“哀帝”，可证其写

于李势时无疑。

《华阳国志》最初也叫《华阳国记》。^③《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意即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极黑水之滨。《常志》所记地区属《禹贡》九州之梁州，故取“华阳”以为名。

《华阳国志》所载，“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其成书时间在永和四年秋以后至永和十年之间。以其卷九云：“永和三年（李旡）从征西于山阳战死”。“征西”指晋征西大将军桓温。按《晋书·穆帝纪》：永和四年八月，进安西将军桓温为征西大将军。故知《华阳国志》的写成必在永和四年八月以后。又卷二载：晋成帝咸康四年，武都氏人杨初杀氏族首领杨毅、杨盘兄弟，“代为主，迄今”。考《晋书·穆帝纪》，杨初死于永和十一年正月，可证《常志》成书必在永和十一年正月之前。

《华阳国志》共十二卷，约十一万字。其内容大体上是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而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但记述稍详；十至十二卷记载三州自西汉至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

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也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

我国方志之作，萌芽于春秋，始盛于东汉。相传孔子见“百二十国宝书”，或即方志的权舆。及“后汉光武始诏南阳

撰作风俗……，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一时形成风气。^④在《华阳国志》之前，各地方志见于记载的已达一百多种，或记述方国的历史，或记载州郡的地理，或叙论乡党的耆宿。而益州地区（主要是巴蜀）撰作之风尤盛，方志可考的就有二十余种，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其中有八家《蜀本纪》、来敏《本蜀论》、常宽《蜀后志》等等历史之书；有谯周《三巴记》、黄容《梁州巴记》等等地理之作；有三家《巴蜀耆旧传》、祝龟《汉中耆旧传》、二陈（陈术、陈寿）《益部耆旧传》等等人物之志。

这一大批著作的传播，为更加成熟的方志的写作开创了风气，准备了材料，积累了经验。常璩正是在广泛吸取三州各种方志材料的基础上，参考《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等全国性的历史著作，再加上成汉政权的档案资料以及亲身的所见所闻，才有可能写出《华阳国志》这样内容丰富的著作。因此我们说，《华阳国志》是中国方志编纂学发展的产物。

但是另一方面，常璩并不满足于“述而不作”。他看到了上述方志的一个共同的缺陷：历史、地理、人物三者分离，各写一面。这样就只能各自反映地方历史的一个侧面，而不能反映它的全貌。于是，他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综合各家方志的优点，又吸取《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长处，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备的地方志的新体裁，即我们前面说的历史、地理、人物和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两个“三结合”。这就使《华阳国志》一书能够更加完整地展示出祖国西南一方上千年间历史的概貌。这是常璩对中国方志编纂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可惜在《华阳国志》之后，中历南北朝、隋、唐，这种体裁没能得到发展，绝大多数的方志著作仍然沿袭东汉魏晋的余

绪，史、地、人分家，极少综合之作。这里有传统的影响、材料的限制（自九品中正制废，对乡里的人物、历史不再象过去那样重视），也与作者的学识有关。只是到了宋代，方志的编纂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少著作取材更为广泛，分门更为详密，奠定了明清以来一般方志的体例。但究其内容，基本上还是历史、地理、人物三方面。追本溯源，《常志》实开其先河。

我国的古方志，流传到今天的已经很少了。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所录，宋元以前的古方志多达二千一百七十五种，现存者已不到七十种；隋以前的除《华阳国志》外，更仅存十来种。这十来种之中，有的真伪杂揉，有的残缺不全，有的内容狭窄，其价值都是远逊于《华阳国志》的。因此这部书可说是我国隋以前古方志中的硕果仅存者。但它并非仅以其古其稀而取胜。试观明清以来的方志，虽则浩如烟海，但是象《华阳国志》那样规模宏大、内容广博、体例简括、取材精审的并不多。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昉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这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二
一 《华阳国志》之所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尤在于它的史料价值。

《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而一至四卷无疑是全书的精华。这里记载着各州的历

史，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路，一方的物产，各地的风俗，主要的民族，乃至名宦的政绩，各县的大姓，等等。它为西南地区古代地理、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在有些方面，其价值超出了西南一隅的范围。下面略举数例。

（一）关于汉晋西南地理沿革。这方面虽有《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及其他一些记载可资参考，但诸史地理志大抵仅列郡县名称，而于沿革及位置或未加说明，或语焉不详。特别是由于《三国志》没有地理志，晚出的《晋书》又大体只反映晋初的政区而且讹误不少，以致后人对蜀汉两晋的地理沿革每觉不甚了了。幸而《华阳国志》对西汉以来的郡县沿革和治城所在记述比较具体，且常璩以蜀人说蜀中及邻区的地理，一般来说，自较外地著作更为可靠。因而这部书也就成了考证古代尤其是蜀汉、西晋时期西南地理的一部主要史籍。唐宋以来的地理书在这方面有很多错误，推其原因，往往是由于忽略了《常志》的记载。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作一点说明，即《华阳国志》的地理部分资料比较庞杂，它并不是根据某一特定时期的版籍写成的，因而它也不是反映某一特定时期的行政区划情况。这与一般正史的地理志是不同的。比如梁益二州所载的一百一十个县，有十八个县为晋以前所置而晋代已废。其中，有的在本书中已注明某时省；有的虽未注明，但根据其他记载，可以肯定早已省并。这就证明，《常志》所载并非完全是晋朝某一时期的区划。盖此书之作，原非止于记录当时的政区，而是为了说明历史的沿革，故而除了到永和三年为止晋王朝的图籍上所有（不一定是实际占有）的郡县之外，昔日曾有、而今所无的

县，也多收入（不是全部收入）。另外，《常志》大部分郡下均载有晋户数和距洛阳的里程。其户数大抵较《晋书·地理志》所载为多。如永嘉以前的十六个旧郡户数，《晋志》不到二十三万六千，而《常志》为三十四万五千，几乎多三分之一。众所周知，《晋志》是依据太康前期的版籍，则《常志》所据资料应在这之后。从三州的政治形势看，到惠帝元康年间为止较为稳定，民户的增殖也应以此时为最多，元康六年梁益二州由轻州改为重州，与此有关。因此《常志》所载当是元康中的户数。不过也不尽然，如宁州永嘉以后所设新郡户数当为刺史王逊时的情况。至于《常志》所载各郡去洛里数，可以肯定是西晋图籍。因为在三十三郡之中，惠帝永兴元年以前的旧郡全部载有去洛里程（与《续汉志》大同小异），永兴后的新郡则概无记载，可证其所据为永兴前的资料。总而言之，我们在使用《常志》的这类地理资料时，应作具体分析，否则容易造成错误。

（二）关于政治史，《华阳国志》一至四卷中也有不少重要材料。试以巴、蜀古代史和诸葛亮征南中为例。巴、蜀地区先秦的历史，在《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典籍中只有东鳞西爪的记载，使读史者为之茫昧。《华阳国志》不但搜集整理了这些记载，而且根据后代已经失传的诸家《蜀本纪》和其他资料，记述了古巴蜀特别是蜀国的历史与传说、秦统一巴蜀的过程以及统一后实行郡县制等情况，才使我们得以窥见这段历史的大概。诸葛亮征南中也是这样。《三国志》记载失之太略，后来裴松之的补注也是语焉不详。《华阳国志》记载就具体一点。我们今天能够知道诸葛亮南征的路线、战争过程中的某些情节，以及战后诸葛亮所采取的一些统治措施，这是

要归功于常璩的。

（三）在经济史方面。比如李冰在蜀中兴修水利，这是先秦历史的一件大事，但求之《史》、《汉》，仅得“蜀守冰凿离碓，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一句。《华阳国志》于此则叙述綦详。据其所载，李冰除修都江堰、穿成都二江之外，还在南安凿平濶崖以通正水道，在犍道烧毁“蜀王兵栏”大滩，导文井江，导洛水，穿广都盐井陂池，等等。这就使我们对古代劳动人民和李冰这位历史人物的功绩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外《华阳国志》关于各地农业生产情况、矿产、盐井和临邛火井的记载，关于成都平原水道的记载，等等，也都是很重要的经济史和自然科学史资料。

（四）关于西南古代民族史，一至四卷中保存的史料也是比较丰富、十分珍贵的。它不但记载了三十几个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和分布，而且对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或部落，如巴（特别是其中的“板楯蛮”）、蜀、氏、羌、叟、濮、夜郎、哀牢等等，他们的历史、传说、风俗，以及他们同汉族王朝的关系，作了较多的叙述，有很多是其他史籍中找不到的。还有一些迄今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记载，如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也将显露出它们的价值。例如卷四存郛县（今贵州威宁一带）下载：夷人称马为“无（古读模）梁”。我们发现这与今天藏缅语族中一些民族（如缅人）的语言吻合或相近。这对研究彝族先民向滇东北、黔西北迁徙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又如今天的仡佬族，古代称为“伶”。一般认为“伶”的名称起于唐宋以后，但《常志》记载：“伶丘县，主僚”。伶丘者，伶人之丘（聚居区），其人属于僚之一种，这应当就是指仡佬族的先民。可见伶人之从僚族中分化出来，至迟可以追溯到晋代。

象这一类材料，好比是蕴藏在地下的宝矿，还有待于学者们的探索与发掘。

除了一至四卷外，《华阳国志》的其他各卷，价值略逊一筹，但沙里含金，决非可以轻视。第五卷叙公孙述、刘二牧的割据史，同晚出的范曄《后汉书》有关部分一样，都主要取材于《东观汉记》（已佚）和《三国志》，可与范书相互参证。第六、七卷蜀汉史，大体上是剪接《三国志·蜀志》，而时有补充，亦不无可取之处。第八、九卷述西晋统一、西南流民起义及成汉时期的历史，不但参考了常宽、杜龚的《蜀后志》（均已佚），而且加进了成汉的档案材料和他的亲身经历，不少是第一手材料，对于研究晋史至为宝贵。唐初修《晋书》、司马光撰《通鉴》，都有所取材。第十至十二卷“先贤”、“后贤”志，主要是根据陈寿《益部耆旧传》和常宽的《后贤传》等书，也有他自己调查所得。总计从西汉到东晋初三州人物，列入赞注和目录的，将近四百人。记载人物事迹之富，在方志中实罕其匹。这当中也不乏可补正史不足的有用材料。例如它记载了好些学者的著作，多为其他史书所未有，对研究古代文化史就很有用。又如他在前四卷中记载了各县的大姓，在这一部分中更有具体的人物可资参证，这对研究东汉魏晋的士族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度也不无裨益。其《后贤志》所记晋代二十人的传（包括著名史学家陈寿），以当代人写当代人，尤为翔实可据。

当然，《华阳国志》这部书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少封建的糟粕。常璩写作此书本来就是要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这从他的《序志》可见。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和英雄史观，在他看来，天命历数决定政治的兴衰成败，地方官的好坏

决定地方的治乱安危，“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言行构成地方历史的主要内容。而且他的思想是属于东汉以来正统的儒家思想，所以在《华阳国志》中有不少三纲五常的腐朽说教和谰纬迷信的荒诞宣传。因此这部书从思想性来看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在编写技术上也不是没有毛病的，如有的地方考证不精，记载失实，有时叙事不够严谨，以致疏漏错乱，还有的材料琐碎芜杂，失于裁剪。不过总的来说，瑕不掩瑜。

三

就现在所知，《华阳国志》最早的刻本是北宋神宗元丰元年吕大防的成都刻本。此本早已失传，仅吕序犹在。至南宋宁宗嘉泰四年，丹稜李至（著名史学家李焘的儿子）因旧本错误很多，“观者莫晓所谓”，于是加以校正，重刊于临邛。其序谓：“凡一事而先后失序、本末舛逆者则考而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设或字误而文理明白者，则因而全之；其他旁搜远取、求通于义者又非一端，……较以旧本之讹谬，大略十得五六矣。”其实他所谓“十得五六”，其中固有改对的地方，但也有妄加窜易而更失原貌之处。比如按照《史记》、《汉书》将原文楚顷襄王时庄蹻伐夜郎改为楚威王时庄蹻伐滇（详卷四注），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吕氏刻本及李氏校刻本最大的遗憾还在于原书卷三汶山郡的大部、汉嘉郡的全部及越嶲郡之一部，卷九的李势志以及卷十（上）的巴郡士女赞注，均已脱去。李至仅发现卷九的阙佚并予以续补，可见其疏陋。

其实在宋代，《华阳国志》尚有完本。不但北宋《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所引《常志》，不少为李本所无，

即与李塨同时、且与其弟李塨友善的王象之撰《輿地纪胜》（李塨有序），也引有《常志》巴郡士女传的好几段文字，可见南宋尚存。可惜这些足本李塨未见，而宋以后都已亡佚，就是李塨的原刊本至明代中叶以后也已绝迹于人间，现今传世的只剩了明、清的各种刻本与抄本。这些本子全是以李塨刻本为祖本，因而大同小异，不过小异之中，还是有优劣之别。今就著者所见的主要版本略加介绍。

明铜梁张佳胤刻本。此本为嘉靖四十三年刻于蒲州，是现存最早的一个刻本，传世极少，即清代学者亦所罕见，可谓珍秘。但从内容来说，并非佳本。张氏是当时著名的诗人，而校勘非其所长，对原本文字每多率意改动，致失其真，反滋疑误。特别是强按卷十一《后贤志》的体例，将卷十（上、中、下）《先贤志》的赞语全部集中于卷首，而后继之以注（即传），因此对原文赞注紧密相联的地方，不得不割裂删截赞语，以求通于文理，弄得衣裳颠倒，甚至不知所云。

自张本出，万历中吴琯刻《古今逸史》，何允中刻《广汉魏丛书》（即何鏊原编《汉魏丛书》的一部分），皆据为蓝本。不同的是，张刻虽打乱李塨原本的次序，但内容并无缺失；吴、何二本则卷十之上、中赞传俱缺，卷十下亦有传无赞，此外卷八也脱去数叶。何本且取消卷数，并妄将原书三州士女目录作为《序志》而移于前，原书《序志》反改称《序志后语》置于其后。如此种种，几使原书面目全非。故此二本在《常志》现存诸本中最无足取，但在明末清初其影响却最大，嘉庆以前坊间多据何本翻刻而时或改头换面，流传甚广，此即清代学者所称之为“俗刻”。

与张佳胤刻此书正好同年（嘉靖四十三年），成都又有刘大昌刻本问世（由杨经发起刊行）。据刘氏自序，系出旧抄，

而参稽范史，订正什一。其校勘的审慎，文字的正确，胜于张刻，即与廖寅题襟馆本相较，也多有优胜之处，堪称善本。不过讹误仍然不少。此本自清代以来传世亦稀。

此外，万历中还有何宇度刻本，亦从李至本录出。惟何氏不懂古书体例，妄将书末《序志》升于简端。^⑥此本今未见。至天启六年，成都又有李一公刻本。此本出自刘大昌本，但李氏亦误移《序志》于书首，改称《凡例》，其价值逊于刘刻。

除刻本外，明代抄本甚多。其传世之最早最精者首推钱谷手抄本（钱氏卒于隆庆六年，此本盖抄于嘉靖、隆庆间），《四部丛刊》即据此本影印。钱本较之刘本，大体不殊，而钱又略胜于刘；刘本正确之处，钱本大都相同；刘氏讹谬之处，钱抄每每未误。欲观李至旧刻的原貌，钱本最为近之。当然刘本未误而钱本讹误的也有。

此外还有隆庆元年吴岫抄本及“愚忠堂”、“山水源头”二抄本。四库全书所著录即吴岫本。此本亦不甚佳。隆庆三年吴岫得刘大昌刻本，有题记云：“岫乃弃去旧抄，宝藏篋笥”。^⑦即此可见此本之不若刘刻。“愚忠堂”及“山水源头”二本抄成的时间及抄者均未详。“愚本”文字与廖寅本的底本最近，盖同出一源，然此本舛误讹脱特甚，最荒谬的是卷十下景毅传至景鸾传中近三百字误接于卷十中任永传后，使人不晓所云。“山本”大致同于钱、刘，而错字较多。

入清，乾隆中，学者丁杰（字小正）得钱谷所藏之另一抄本，为之校勘。^⑧后举以赠绵州李调元，李于乾隆四十七年刻入《函海》。此本卷十不分上、中、下，文字则与钱氏手抄本大同，而丁、李又别以刘、李（一公）、吴、何（镗）诸家之异同分注于有关字句之下，甚便于对勘阅读。

至嘉庆十九年，廖寅题襟馆本出。此本的校勘出于著名校书家顾广圻（字千里）之手，廖寅的序言及卷末所附三州郡县目录亦顾氏所为。在此之前，除丁杰、李调元外，如惠栋、何焯等不少乾嘉学者都曾校勘《常志》，但大多限于版本的对照。顾氏则广取有关史籍与《常志》参校，故其于订讹补阙，所得独多，而题襟馆本遂为诸本之冠。可惜顾氏于钱抄本及嘉靖张、刘二刻、天启李一公本乃至《函海》本均未曾寓目，其所据底本（常熟冯氏空居阁本）^⑥及参校的其他本子（如季振宜家所录本，何焯手批钱谷旧藏本，吴、何本等）^⑦皆非善本，又其校订亦往往尚欠精审，因此讹误之处犹多。著者曾取题襟馆本同钱、刘、二李本对比，发现后者是而前者非者多至百余处。尽管如此，顾千里的功劳是主要的。后来印行《常志》者大抵都是翻印顾校题襟馆本。道光中顾观光写《华阳国志校勘记》也是以此本（顾观光误称为“宋本”）校正俗刻本，并全录顾千里的校语，自己很少创获。

对于《华阳国志》一书，前人向无注释。解放后，任乃强老师撰写《华阳国志校注图补》一稿，是为首创。又近年日本学者船木胜马写有《华阳国志译注稿》，连载于东洋大学亚非文化研究所《研究年报》，但校注者未见。

四

正是鉴于《华阳国志》这部古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进一步整理之必要，校注者不揣陋陋，进行了这本《华阳国志校注》的撰写工作。

本书校注的意图是为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本简明的中级读物，因此在校注中力求避繁就简。在文